

史述与想象——《回归天堂》的诗化策略¹

吴敏²

目次

引言

一. 史述与想象——民族英魂的构建策略

二. 意象与背景——提炼升华的诗情诗话

三. 独白与对话——英雄行为的价值追寻

结语

引言

1905年，韩国被迫签订《日韩保护协约》后，开始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韩人艰苦卓绝、可佩可叹的反日独立运动拉开了帷幕。1919年“3·1”独立运动惨遭日警镇压后，韩国大批爱国人士流亡中国，先后成立了各种反日团体，开展民族独立斗争。

在这些团体背后，都若隐若现地关联着一个组织——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尤其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它已成为连接众多韩人团体共同抗日的民族政府之象征。这种重要地位的确立，与临时政府重要人物金九策划和组织的一系列威震四海的爆炸和暗杀事件有关。其中最激发韩国志士斗志、鼓舞斗争士

¹ 本论文曾在2009年4月25日—26日在中国浙江嘉兴日报社召开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叙事与嘉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现又稍作修改。

² 韩国外国语大学博士修了，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miao_wu97@hotmail.com。

气，让中国政府及人民对临时政府刮目相待的，当数金九策划的震惊中外的“上海虹口公园爆炸事件”。

1932年淞沪战争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对此，日本得意洋洋，气焰嚣张，决定于4月29日天长节（昭和天皇生日）那天，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淞沪战争胜利纪念大会”。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长的金九，经与中方军政要员陈铭枢（时任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蒋光鼐（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19路军军长）、吴铁成（上海市长）等共同策划³，决定借此机会对日寇发动一次爆炸袭击，以此打击日寇的气焰，振奋中韩两国的抗日士气。经过严格挑选，金九派“韩人爱国团”团员、爱国志士尹奉吉担当暗杀任务。4月29日，尹奉吉混入虹口公园，趁日本军政大员检阅军队之机，投弹于检阅台上，将正在高唱国歌的高官白川义则、重光葵、植田、野村、河端等人炸死炸伤。

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外各界巨大震动，世界为之瞩目。当时国、共两党都对尹奉吉义举表示高度赞赏和钦佩，中国共产党将尹奉吉看作“沪战烈士”，蒋介石更是以“中国100万大军不可，惟一韩国青年尹奉吉遂成。”⁴之语赞叹尹奉吉义举对中国民心的巨大鼓舞作用。尹奉吉由此成为继安重根击毙日本侵朝元凶伊藤博文之后，又一个振奋国人并引起国际社会巨大反响的英雄义士。此次事件使中国各界认识到韩国独立运动的力量，以及独立运动义士对中国抗日局势的有力支持，由此开创了中韩联合抗日的新局面。此后，蒋介石政府开始与韩国临时政府直接接触，并对独立运动直接提供军事和经费的支持。

³ 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三个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杭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⁴ 夏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371页。

尹奉吉事件是韩民族在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后发出的不屈呐喊，是向世界发出的不平之声。尹奉吉的义举向世人昭示：在面对共同的生存危机关头，中韩只有精诚携手，以血肉之躯奋勇直前，才能在民族自救和中韩互助中求得民族的最后独立。金九在“虹口爆炸案”后写的《屠倭实记》中，对相隔不到半年的李奉昌⁵和尹奉吉义举的意义作了深刻阐发：“呜呼大势亟矣，使不幸中华而受制于日，则其所受之惨毒艰苦必十百于昔之满清，而其复兴之难亦必十百于辛亥之役，吾韩更有万劫不复之痛矣！故如吾韩计复韩国，必先救中华，为中华计复韩国亦以救中华。此鄙人所以喑口哀音，以望吾华韩两同志之共醒以期共命于战场也！”⁶他宣告了中韩联合抗日，为最终取得国家独立地位的斗争意义。因此，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刺杀或暗杀，而是如安重根临刑前所朗朗宣告的：“我为大韩独立而死，为东洋和平而死，死何憾焉。”⁷他们以生命奉献于民族的独立与东亚的和平，为追求人类正义而献身，炳炳烺烺，光照千秋。

这段历史，在当代著名作家夏辇生的倾力挖掘下，全景立体式地表现在她的史诗性长篇小说《回归天堂》中。

一. 史述与想象——民族英魂的构建策略

《回归天堂》作为一部传记性的历史小说，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事件基础上的文学叙事。作者把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多向整合，用想象架起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的桥梁。那么，如何把历史史实纳入文学的想象世界？在从历史到文学叙述的转化之间，作者进行了怎样的处理？在中国现当代韩人抗日英雄形

⁵ 由金九先生策划的另一起引起轰动的独立运动义烈事件：1932年1月8日，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不幸未中，李奉昌被捕，后英勇就义。

⁶ 金九，《屠倭实记》，见夏辇生，《船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38页。

⁷ 杨南邨编撰，《世界亡国稗史》，1917年11月，第75页。

象中，《回归天堂》的价值诉求有何新的开拓？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本文将对《回归天堂》的叙述策略进行文本和历史的双重阅读，以揭示夏鞏生对韩人抗日独立运动历史的当代阐释。

按照新叙事学的观点，历史叙事也具有文学叙事的虚构性，他们间的关系和区别就如柯林武德所说：“作为想象的作品，历史学家的作品和小说家的作品并没有不同。它们的不同之处是，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小说家只是单纯的一项任务：要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⁸也就是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是借助历史叙事的资源来阐释当代的价值追求，为时代精神创设堪称“英雄形象”的象征符号。文学中的“英雄形象”不同于历史中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美学概念，塑造英雄形象的目的，在于唤起接受者或崇高、或悲壮、或焦虑、或亢奋的审美情感。

关于尹奉吉短暂一生的真实资料，除了金九先生的《屠倭实记》和尹奉吉的两本诗集和几封家书遗言外，没有更多的史料可供参考。但资料的有限或空白，正是作者飞扬想象的启航站。由于《船月》和《虎步流亡》在韩国出版后产生热烈反响，作者因而有机会踏上韩国的土地，去烈士故乡作实地采访。这是一个体验韩国文化，触摸英雄生命脉动的实地经验，通过丰富的艺术触觉和情感体验，夏鞏生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故事。《回归天堂》就是作家追寻历史脚步，追问烈士灵魂的史述与想象之旅。

如果说，史家所重视的是客观意义的真实性，那么，作家不仅需要“史”的观点，更需要特殊的与人伦相关的“故事观点”，即在选择史实进行文学叙事时，更多地关注有关英雄个人成长的历程，关注英雄个人与家族、家庭间的关

⁸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79页。

系，也更注重正义与崇高的伦理诉求。可以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是历史英雄叙事的审美性、虚拟性、隐喻性的艺术化形态。它积淀了作家个人的经历、情感和潜藏的英雄崇拜情感，经过想象等文学化思维，进入象征、隐喻式的文学形象创造。

当然，好的作家应该既不拘泥于历史的细微末节而失去艺术的审美创造活力，又不能委屈历史自身的真实。《回归天堂》在平衡真实与虚构这两者的关系上，采用了双向多层的架构方式。所谓双向，就是作者与英雄双向的心灵对话。所谓多层，就是第一人称采访手记、第三人称客观叙事和义士的内心独白这三种叙事交叉呈现，互补对话，多向立体地驰骋于历史与想象之间，将历史打磨掉岁月尘封的锈蚀，让它闪烁出新时代的光泽。

作者在小说中，对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严格遵照历史史实，并以传奇笔法叙写金九、安重根等历史人物的经历，以及他们对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的追索。小说前半部着重展开与英雄相关的众多独立运动先驱的历史风云图，在与时代人物共时和历时性的联系中，展现尹奉吉行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作家详细描述了尹奉吉的青春、斗志和昂扬向上的生命活力。把他的思想成长放到整个民族痛苦求索的大背景中，立体化地呈现了战争人生在民族心灵中搅起的波澜。这里有朴殷植、申采浩等思想先驱的痛苦思考，有“月进会”等多种民间组织的秘密求索和启蒙活动，也有烈士安重根、李奉昌、白贞基殉身正义的激荡和震撼。有进步思想的引导，有不同于历代统治者的人生理想，有对封建关系的全新感受，还有对严酷现实和国家的清醒认识以及改革社会制度的愿望和行动。这些都化作了尹奉吉对民族苦难的沉重思考和为民族利益献身的牺牲精神。这是尹奉吉思想的升华，更确切地说，也是作家对国家、历

史、政治革命、战争苦难等哲学思考的升华。这使《回归天堂》不同于以往小说的战争叙事和历史叙事模式，而有了对民族根本命运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真、善、美和崇高的体悟。

如果说，英雄的成长过程以及那段历史风云的叙述，凭借一定的史料借鉴，主要以实录为主的话，那么，英雄义举后，从被捕到就义的那段艰难时日，因无确切资料可寻，真相就如深埋井底的细沙般难以打捞。所以，作者在后半部采用虚实相间的手法，发挥女性作家特有的感性特征以及童话作家擅长的诗化思维，以虔诚敬仰的情怀将英雄受难到遗骨回归直至神话般的山河感应模式一一呈现于小说叙事中。

此时，想象力就成为区别艺术水平高下的标志，也是产生感染力的重要来源。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面对历史时，想象力的作用应该是“发掘出历史潜在的可能道路，明辨出前人特定时空局限下无法言明的方向和轨迹，补充起时间流逝后无法复原的葳蕤细节，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帮助历史舒出那口积郁已久的浩然长气！”⁹笔者认为，《回归天堂》正是做了这样的努力。

作家在诗化叙述中，既有激情挥洒的热度写作，如英雄就义那天灵魂与故乡、与亲人跨时空的告别和将军峰的崩塌；遗骨回归时天堂鸟齐聚歌唱的诗化想象。也有极尽克制的零度写作，以反衬英雄的悲壮美。有道是：“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义士投弹后未及拉响身上的炸药，不幸落入敌手，随后的日子，将是生不如死的地狱般的磨折。作家抓住尹奉吉从被捕到牺牲时的受难和心灵低语，运用多层交叉叙述，调动象征、心灵对话、家乡亲人的思念描述等多种手法，让读者和英雄一起走过这段艰难、痛苦而又漫长的过程。作者在写

⁹ 仲言，《在历史与想象之间》，《人民日报》，2003年6月24日，第十四版。

这部分文字时，正是在医院陪伴母亲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的时候，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联想到24岁的英雄在层层封锁的铁墙里与世隔绝的孤单，以及他凭着如何坚强的意志面对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作者似乎不忍花太多笔墨去想象和渲染那种残酷的情景，只是用了一段最客观克制的文字，记叙了义士遗体被挖掘出来的情形：

“挖出来时，棺木已经腐烂，十字型的刑架也只剩下一根直木，208块遗骨中只找到了201块，细查之下少了7节手指骨。显然，早已丢失在倭寇的酷刑中。

残缺的遗骨，铁证如山地将一段不该残缺的历史公诸于世！”¹⁰

克制的笔墨，流泻出的震撼和悲痛却并不亚于直接或热度的描写。烈士不为人知的受难赴死经历，通过作者的考察和对读者想象力的激发，已经达到了向真实还原的程度，它所发挥的巨大感动效果，事实上与热度写作异曲同工。

二. 意象与背景——提炼升华的诗情诗话

夏辇生作品中诗化的意象比比皆是，其中，“鸟”、“太阳”、“月亮”、“船”等都是夏辇生最喜采用的意象，在“韩流三部曲”中，这几个意象都有出现。

夏辇生偏爱鸟，《船月》和《回归天堂》多处以“鸟”的意象出现：《船月》里有算命鸟、太阳鸟，《回归天堂》里则是火鸟——天堂鸟。鸟的空灵、纯净、圣洁，象征着灵魂的高贵、自由，它有来自天堂的神秘，又有点缀苍生的

¹⁰ 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396页。

悲悯，更是灵魂升华的象征。在《回归天堂》中，作者让尹奉吉这个为民族独立而受难的英雄化身为浴火重生的天堂鸟，让他从凡间进入天堂，这是对英雄最高的肯定和敬仰。

比如，最震撼的一幕出现在烈士就义的那一刻，作者以激情、深情的笔墨描写英雄化身为永生的火鸟，回归天堂：

将军峰顶，如火山爆发，喷吐出一股浓烈的火焰。火焰，在盘旋中升腾，时如烈豹，时如巨蟒，最后变成一只全身透红的火鸟，站立于将军峰顶。几乎同时，在大亮的天光之中，苍天在东方睁开了一只巨大的天眼。火鸟低下头来，最后看了一眼大地，然后，抖开它巨大无比的翅膀，飞入天眼深处……¹¹

这个鸟的意象，从第一篇采访手记里提到像喜鹊一样的鸟叫，继而是尹奉吉小时所养的鸟，它的羽毛闪着来自天堂的光芒，随着书中的叙述和采访手记的提引，凤凰鸟（火鸟）的意象渐渐清晰：作者在韩国品尝中国菜，“菜做得十分精致，特别是花式冷盘中一只用白萝卜雕成的凤凰，让我找到了一点关于天堂鸟的想象……”¹²传说中凤凰投火，涅槃更生的意象，经过作者匠心构思，步步提炼，最终由崩爆的将军峰里飞出，终于回归天堂。凤凰鸟最终升华为象征尹奉吉精神不死的天堂鸟。

总之，“鸟”的意象的提炼过程本身也成为叙述和诗化的重要部分，天堂鸟之回归天堂，便成了尹奉吉精神的象征，那就是义无反顾、决然牺牲、纯净绚

¹¹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392页。

¹²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52页。

丽的崇高情怀以及精神不死的永生，也是“揉合着阳光的激情和月光的冷静，灿烂，纯净而绚丽！”¹³的圣洁而崇高的韩民族英雄的象征。

其次，作者的诗化和诗情还在于将英雄置于特定的地舆环境，从中体现英雄的伦理亲情，并在此亲情背景中，更突出义士抛家弃子，为民族独立舍身奉献的伟大和崇高。

“地舆”作为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场域，会形成一定的风俗特殊性。作家在记叙自己走进韩国，走近英雄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和倾心体验的就是英雄生活过的地舆环境。作家深入民俗村、农场、集市，感受和发掘英雄的遗迹，寻找历史与现实对话的触发机关。她从礼山“农民节”、“苹果节”等民间文化中读到了礼山人“炽热与博大的情怀”¹⁴。

“被浸泡在这种礼山的人文历史中，我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而感觉到，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¹⁵

经过十多天礼山采访的感性体验，作者已将自己融入了英雄呼吸和生活的场域，获得了与英雄对话和感应的精神气场，于是，激涌的诗情和蓬勃的想象便于此孕生。

其实，社会本身具有的“人伦结构”与“人情网络”特质，对该地域性结构中产生的人物有着重大的影响，作者深悟，透过地区性群聚效应以及存留于“群体记忆”中的意识影响，更能抓住生长于斯的英雄的生命脉络以及他对历史、对民族的哲思所产生的深厚基底。

在撰写《船月》和《虎步流亡》时，作者已被义士的义举所震撼。而“如今，我与义士离

¹³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397页。

¹⁴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70页。

¹⁵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267页。

得那么近，并目染着礼山如此苍翠的青山和烂漫的山花，去联想68年前‘4·29’虹口爆炸时那声巨响和义士出发前‘如同农夫下田劳作’般平静的神情，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¹⁶可以说，夏辇生把《回归天堂》里的英雄置于乡邻、家族、亲属的层层伦理联系中，凸现其成长和思考的地舆背景，使英雄的成长牢牢扎根于他的民族土壤。

由汉诗神童到改革乡学；从创办月进会，抵抗日本势力，到寻找救亡之路，毅然离家出走；从决行义举，到壮烈就义，所有的成长和思考都离不开家乡、民族。在此基础上，又扩大到对国与国之间共同命运的关心，最终为中韩联合奋斗，实现东亚和平的梦想奉献了年轻的生命。所有这些活动，其地域空间大半都在礼山。尤其是就义那天，义士的灵魂回归家乡，与故乡、与亲人告别。作者采用义士的第一人称心灵独白，将“微笑的月亮”意象幻化成一个个亲人的笑脸，串起与亲人跨越时空的灵魂交流：他向父、母、妻、儿、弟、妹一一告别，而“最大最亮最饱满的月亮”就是义士倾力创建的地下反日组织——月进会¹⁷。当义士的灵魂跨越时空，与故乡，与家族，与亲人告别时，作家的诗情之笔也到了如将军峰崩裂那样的激荡和爆发。

三. 独白与对话——英雄行为的价值追寻

英雄理念是文化心理构成的重要因素，它的释放、凸显、消解与时代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在后现代文化盛行的今天，在戏说历史、消解英雄成为时尚的文化氛围中，作者却致力于塑造异国的历史英雄，从中挖掘对本民族有用的精神资源。因此，她的英雄叙事自然不会象战争年代那样功利化或平面化，必然有新的诉求和策略。除了诗化的艺术处理以提升英雄生命哲学和舍身奉献

¹⁶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285页。

¹⁷夏辇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372-373页。

民族的崇高以外，夏羣生还找到了一手挖掘历史，一手牵出未来的关节点，那就是“对话”——与世界的对话。即一方面用诗化追寻历史遗踪，另一方面用“对话”追问英雄意义。

纵观《回归天堂》的结构，可以说，“对话”已成为贯穿始终的隐在结构：它由三部分组成，即作家与历史的对话、作家与义士的对话以及作家与世界的对话。

首先，作家与历史的对话。

历史作为一个被阅读的文本，总是包含着许多意义空白和未定性，需要作家发挥想象去补充，使之具体化。挖掘尘封的历史，形成“这一个”带有作者鲜明艺术特色的传记性文学，这本身就是个姿态。经过创作主体与历史的对话、感受和理解，作者选择了这段为两国民众渐渐淡忘的共同携手反抗日本侵略的历史，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揭示出独立运动的意义和价值。

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塑造的韩人英雄形象，往往受战时环境的影响，文学创作未免带有为救亡服务、为宣传服务的战争功利色彩。对异族的描写，不是极力展现亡国的苦难，就是极力推崇抗争的英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人物塑造难免有些单薄和平面，他们的言行举止，表里内外，都染上了激愤、壮烈的浓厚色彩，乃至成为韩民族的一种符号或“套话”。¹⁸而七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和平为主导的国际环境下，在多元化主题和新的审美需求下，作家所塑造的英雄形象，就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有了进一步深化和崭新的开拓。夏羣生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丰富而立体的，其中既有赴汤蹈火的壮烈之美，亦有老吾老及其老、幼吾幼及其幼的人性之美；既有对仇敌之痛绝，又有对和平

¹⁸ 有关论述参见拙作《二三十年代韩国独立义烈斗争形象》，《中国学研究》，韩国中国学研究会，2008年1月。

之挚爱；既有战火中永生的阳刚之气，更有永不熄灭的人类爱情之美，可以说，夏辇生找回了英雄战士的七情六欲，让他们从政治理念的符号变成了活生生的人。

其次，作家与义士的对话。它由作者独白式的采访手记和义士的内心独白组成。

夏辇生擅长运用心灵独白来展现人物内心，她为《船月》设计了最独特的《漂在水上的日记》，“用一个船娘手中的橹写在了水中”的经历，借以揭示船娘朱爱宝对世态人情的情感轨迹。《漂在水上的日记》在小说的每个章节前作为“引言”出现，这与《回归天堂》的结构十分类似。

《回归天堂》每一章前也有引言，那就是一篇篇采访手记。它记录了作者一步步走近韩国、亲近韩国文化，走进尹奉吉生活的地域空间，把握英雄成长的思想轨迹和独特的生命哲学的过程。

采访手记成为结构和意象的诗化来源，也成为诗情勃发的触发源。作者参与义士故乡的文化活动，走访供奉尹奉吉巨幅画像的忠义祠。当她望见英雄那双眼睛时，她被深深地震撼了。她读出了英雄超越年龄的镇定与平静，读出了英雄坚毅、刚强之外的对民族命运的忧伤。由于对英雄行为的感动，作者产生出喷涌的创作激情，她采用浪漫主义的超现实技法，让英雄的灵魂实现与故乡亲人的跨时空相聚，写到了义士牺牲那天凌晨母亲的惊梦，写到了跨越时空的心灵感应和山河感应。

除了作者独白式的采访手记，小说中还大量出现尹奉吉义士的内心独白，它不仅和第三人称客观叙事紧密呼应，增加了情节的纵深感，同时，又能切入义士精神世界的最深层面，探查其灵魂深处的奥秘，揭示其“英雄”行为与生命

意义的关联。

义士的内心独白与作者采访手记的独白，还有第三人称的史述，三者叠加，形成了一种隐在的对话关系，暗合了作者塑造异国英雄的价值诉求——“与世界对话”¹⁹。

再次，作家与世界的对话。

“与世界平等对话”的诉求，一直是中韩民族从近代遭受屈辱不振，面对民族危亡以来最强烈的愿望。先烈的努力是想获得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话语资格，而今的目标就是要与世界对话。这是中国积弱百年后，希望追上世界脚步，开放自强，面向未来的过程中，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强烈心声。作者抓住了这种民族文化心态，通过异国的英雄叙事，将烈士的英雄行为与当代语境对接，隐现了从过去至今百年来中韩两国的共同诉求和精神连接，由此，历史叙述便有了全新的当代阐释意义。

“艺术的使命在于替一个民族的精神找到适合的艺术表现。”²⁰时代的距离、交流的深化、非意识形态化的创作环境，使夏鞏生得以从容审视、咀嚼过往的历史，去发掘和考察韩民族的全貌，让我们真正感受到韩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以及他们的思考模式和情感模式。

夏鞏生在《回归天堂》后记中说：作家的梦想是“与世界对话”，笔者以为，这也正是韩国独立英雄斗争的灵魂所在。世界是多元的，每个民族都有在地球村生存的权利，促进民族平等和人类正义，是韩国独立英雄斗士们舍生忘死追求的目标，更是全人类为之奋斗的最高价值观，从这一意义上说，英雄斗争表现出的感情、意志、信念、行为以及在此基础上引伸出的责任和道义，是

¹⁹ 夏鞏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第401页。

²⁰ 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第375页。

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属于韩国，同样也属于中国，属于整个世界。

结语

夏鞏生的《回归天堂》以异国英雄的塑造，重新将那段中韩共同反法西斯的历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借助小说的历史叙事阐释当代和平发展对话的价值诉求。

本文以《回归天堂》的历史叙事和诗化策略为研究中心，指出夏鞏生擅长运用意象和地輿背景为塑造人物、渲染情感服务。由于充分发挥主体情感强烈的特色，作家以采访手记、情节叙述与英雄内心独白的交叉对话方式推进情节、情绪的起伏展开，形成了小说浓郁的诗情诗化的独特风格。由于对英雄行为的考察进入了人类生命意义的更深层次的开掘，使得《回归天堂》与战时的韩人题材作品有了鲜明的区别。

参考文献

杨昭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三个时期》，“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杭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3年。

夏鞏生，《回归天堂》，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

夏鞏生，《船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杨南邨编撰，《世界亡国稗史》，1917年11月。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仲言, 《在历史与想象之间》, 《人民日报》, 2003年6月24日, 第十四版。

黑格尔著, 朱光潜译, 《美学》第2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吴敏, 《二三十年代韩国独立义烈斗争形象》, 《中国学研究》, 韩国中国学研究会, 2008年1月。

<Abstract>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Imagination

-The Poetic Strategies in "Return to Paradise"

Wu Min

The paper, based o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poetic strategies in "Return to Paradise", points out that Xia Niansheng is expert in characterization and rendering emotion by using imagery and area background. Due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characteristics' strong emotion, the writer promoted plot and emotion ups and downs, by interview notes, narrative plot or the hero's inner monologue alternately. Because the writer explored more deeply the heroic acts in the meaning of human life, "Return to Paradise" has distinctive difference from other novels about Korean in the war.

Keyword: Xia Niansheng "Return to Paradise" Yoon Bong-

Gil Poetic